

CSSCI集刊

演化与创新

经济学评论

2017年
第2辑（总第17辑）

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演化经济学会 协办



科学出版社

**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7 年第 2 辑（总第 17 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 协办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由陈劲教授（主编）与王焕祥博士（执行主编）于2008年共同创办、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协办，是国内唯一一份致力于介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及最新发展的集刊，与国际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SSCI）、《制度经济学杂志》（SSCI）长期合作，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纳尔逊教授、伦德瓦尔教授、霍奇逊教授、陈平教授、贾根良教授等为本刊特约编委与撰稿人。

本集刊以“倡导学术创新、彰显学术自由”为宗旨，力求为中外学者就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讨论与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也为展示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与思想提供一个机会窗口。

本集刊可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视野与借鉴，可供政府产业与科技等管理部门、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与科技工作者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管理学、经济学等社科专业的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参考，对于想了解 and 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人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7年. 第2辑: 总第17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03-056167-1

I. ①演… II. ①教…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7941号

责任编辑: 马 跃 / 责任校对: 贾伟娟

责任印制: 霍 兵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 3/4

字数: 155 000

定价: 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主 编

陈 劲

执行主编

王焕祥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虎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陈 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何自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孟 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沛民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韦 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魏 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吴贵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叶 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张 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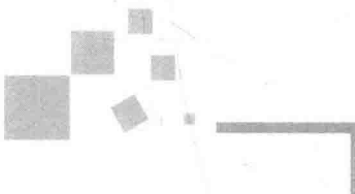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英文字母排序)

Bengt-Åke Lundvall	丹麦奥尔堡大学
Eric von Hippel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Franco Malerba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Geoffrey M. Hodgson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Phil Cooker	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Qingrui Xu	中国浙江大学
Richard R. Nelso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Ron Boschma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地理学院
Ron Martin	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

编辑部联系方式:

电话:0086-10-62792422

邮箱:ei_review@tsinghua.edu.cn



摘 要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近年来在国际学界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以及该理论范式主导下的创新经济学,展现中国学者在这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取得的进展,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讨论提供平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内容涉及关于中国“新常态”增长的反思、中国软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达尔文演化隐喻的范式意义、演化经济学视角下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内生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项目周期、三重螺旋研究述评以及微观企业创新驱动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的 ABS 分析等理论命题与实践问题。

本专辑突出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演化及创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特定领域内的应用等重要学术前沿话题,也与我国制度创新深化与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实践主题相呼应。

本专辑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学理思考与借鉴,可供政府科技领域的高层领导、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管理学专业、经济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参考用书,对于想了解和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读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目 录

关于中国“新常态”增长的反思	DicLo 韩嘉怡译 (1)
中国的软实力诉求：作为一个软实力机制的“规范扩散”	李 彤 覃 虹译 (13)
演化经济学如何误解了隐喻：达尔文演化隐喻的范式意义	王焕祥 (30)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内生解释——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姜景军 (40)
地方政府创新的项目周期与政策周期协同性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来自于西北地区案例的实证经验	郎 玫 (53)
三重螺旋研究述评及其最新进展	王成军 王永慧 胡登峰 (71)
微观企业创新驱动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的 ABS 分析	钟章奇 张 旭 (85)

关于中国“新常态”增长的反思^①

DicLo 韩嘉怡^②

摘 要: 经济增长放缓已然成为中国新常态自 2008 年发展至今的趋势特征。而有关经济衰退的解读,通常都围绕需求不足以及盈利能力下降展开。本文剖析了这类研究的理论推理和实证依据,从而厘清结构制度环境对经济绩效的基础作用。鉴于此,本文判断,长远来看,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中速乃至高速经济增长取决于近年来国内所实施的两种经济转型模式之间的抗衡,即生产导向模式与投机导向模式。

关键词: 新常态 生产导向模式 投机导向模式 增长 反思

中图分类号: F019 F061 F091

一、概 述

经济增长放缓已成为中国新常态自 2008 年发展至今的趋势特征。2008~2011 年,得益于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中国经济以每年近 10% 的增速保持高速增长。而 2012~2014 年,增长率跌至 8% 的水平,且自此跌破 7%。截至 2017 年,少有证据表明增长放缓的情况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得到逆转^③。

然而,增长放缓是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中国的国家领导层如今正式使用新常态一词来表明经济增长放缓将很可能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瓶颈。抑或,这仅为领导层的观点,而非公开表明以过去三年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如今中速增长阶段表现为特征的“L”形曲线观点^④。由此,国家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也始终以此视角为基础依据。

由于增长放缓是长期趋势,其所呈现的问题也表现为结构制度条件在此过渡期所扮

① 本文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 DicLo (卢荻)教授应本刊之约而写作的专稿。

② DicLo,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全球化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韩嘉怡,译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创新。

③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中所有统计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及中国统计出版社和《中国统计年鉴》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④ 人民日报在 2016 年 5 月 9 日采访的一名“经济权威人士”使用“L”形曲线来隐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具体见 <http://news.163.com/17/0310/10/CF5MQBHL000187VE.html>)。同日,新华社发布了相应访谈(具体见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5/09/c_1118833995.htm)。

演的重要角色。观点因人而异,但主要围绕两个论调展开,即需求不足和盈利能力下降。这些观点皆得到不同角度的学术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的支撑,但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国家领导层亦在兼收并蓄地面对不同答案的同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旨在解决这些有关问题。

因此,本文将梳理这些不同论调的推论,并将它们进行比较,从而构成适宜的综合论述。考虑到上述不同论调的实证事实因素,本文还试图进一步解决如下问题:保持中速增长,乃至恢复高速增长,需要什么样的结构制度条件?由此预测,为了应对需求不足和盈利能力下降的问题,政府政策的设计需要以巩固生产导向模式为首要考量,而非屈从于投机导向模式的压力。这也相当于在一个极易被投机行为钻空子的金融扩张世界中,重塑中国经济转型的模式。

二、投资增长的停滞和需求侧的束缚

在新标准下,经济增长放缓可辨识的直接原因是生产性投资增长的沉积。1980~2011年,伴随着年均名义投资 22%的增长率,中国经济保持着 10%的增长速度。然而,2012~2017年,年均名义投资增长下降至 15%的水平。这两个区间的平均年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15%。其中,投资增长在 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上半年,分别下降至 12%、9%和 4%。

如图 1 所示,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同时,图 1 也体现了这两个变量各自 5 年移动平均数的变化趋势。在整个改革时期,两个变量的变化几乎是相同的,只是投资增长的波动起伏相较经济增长的波动起伏更大,这种重复的波动在 2008 年增长放缓后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成分,而这一次的经济放缓似乎远比先前的更持久。所以,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性的联系。

2008 年之后,尤其是 2011 年后,主要非国有资产的投资增速放缓,占近年总投资的 60%。如图 2 所示,非国有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在 2008 年骤然下滑,由往年 30% 以上的增长率跌至 20% 左右。此后,在接下来的三年,受益于政府大规模资本输入的扶持,增长趋势反弹。而从 2012 年开始,增长率又开始连续下行,在 2016 年降至 4% 后,于 2017 年上半年降至 2%。

就概念而言,可知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也许会通过以下两种形式阻碍经济的增长。首先,投资是总开支的组成部分,有可能在现阶段对经济增长形成需求侧的束缚;其次,投资通常是扩大生产力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基石,也将制约长期的经济表现。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资产占总投资比重的优势意味着,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中,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导向的判断与决定占主导地位。至少,在国家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可作此解读。因此,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持续更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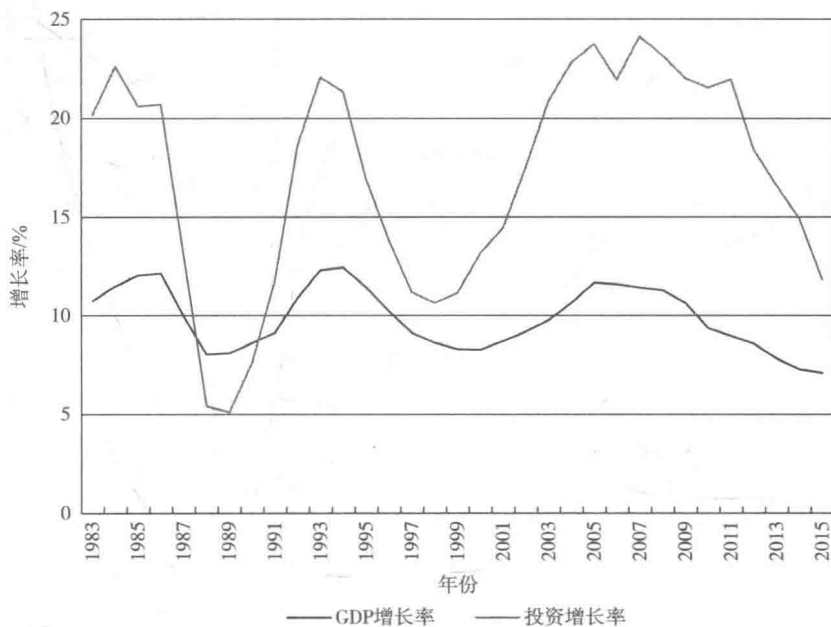


图1 年 GDP 增长率及投资增长率 5 年移动平均数

投资指固定资产总投资，其增长率将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年鉴（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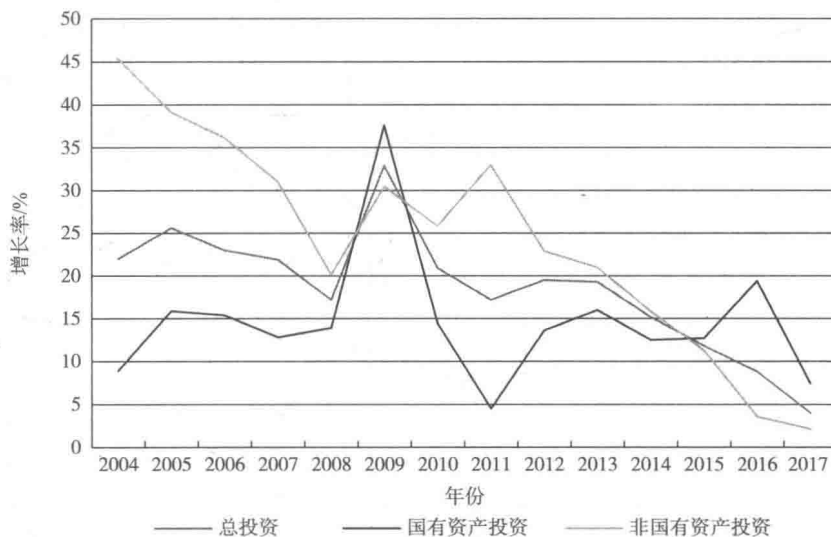


图2 国有资产投资及非国有资产投资年增长率

投资指固定资产总投资，其增长率将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年鉴（2017）》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就投资增长乃至经济增长放缓的缘由而言，讨论主要围绕需求不足和盈利能力下降进行。因为需求不足和盈利能力下降都是长期而非短期现象，所以它们必将深深植根于经济转型模式内在的某些结构性制度条件之中。

其中,在探讨需求不足的文章中,相应的推导和实证都十分明了且直接。有关产能过剩和过度出口的研究与新闻报道比比皆是,且造成了与他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在钢铁、水泥和煤炭等行业,此类摩擦在 2011 年后更加显著。特别是 2007~2013 年,经历空前繁荣盛况以及零星复苏之后,房地产和土地开发行业的发展停滞成为许多其他行业需求不足的原因。与此同时,伴随产能过剩出现的还有滞销和工厂倒闭。因此,该阶段的投资直接导致库存堆积。例如,著名“鬼城”(即空置或半竣工住宅占比过高)现象的形成。而上述情况将最终削弱投资情况,包括对需求环境不是很敏感(相较于非国有资产投资)的国有资产投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需求不足不等于社会需求短缺。毕竟,在当今中国,仍存在足够空间允许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大量农民家庭寻求进入城市,并在城市安家置业。但囿于该群体缺乏充足购买力,加之城市物业价格高昂,此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而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之间的背离,则再次表明利润导向在当下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因而,产能过剩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引出新常态之下需求不足的普遍命题,即总需求结构失衡。其主张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并且,其进一步指出,该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因为全球经济大衰退对中国出口的打击,也因为投资增长只会增加过剩的产能。最终,劳动所得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下降,引起了所谓由收入分配恶化产生的“消费不足”,从而开启有关经济转型主流模式的讨论^①。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国家领导层一直试图通过促进以消费替代投资和出口的方式来“再平衡”当前经济状况。这也显示出有关需求失衡研究的重要性。

三、总盈利能力下降的多种缘由

盈利能力下降,是指整体经济利润率持续下降。从概念上讲,在市场经济中,投资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下降则必然会对投资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经济新常态情况下,非国有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主要部分,且二者同时放缓增长速度。由此可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亦可能是由盈利能力下降导致的。

现实中,实际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关于中国经济盈利能力下降的直接实证依据相对零散,这归咎于官方对总利润率估值的缺位。实际上,所存在的数据仅仅是工业部门一系列利润相关数据。图 3 显示了税前和税后工业利润年增长率 5 年移动平均数。如图 3 所示,这两个序列呈现出从 2008 年前高速增长到 2008 年后低速增长之间的大面积跌幅。直到 2014 年,税前利润增长率几乎为零,税后利润增长则转为负值^②。尽管如此,从工业利润率(即利润与总资本之比)的变动来看,又有不同观察结果。如图 4 所示,1980~2014 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税前工业利润率确实有下降趋势,但利润率水平同比前 30

^① 对于需求不足的原因和意义,以及中国经济失衡的阐述,可详见 Akyüz(2012)、Palley(2006)、Zhu 和 Kotz(2011)。同时,Lo(2013)也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上的评判。

^② 此句为原文直译内容,未在图 3 中直接体现出来。——译者注

年仍然相对偏高。



图3 税前和税后工业利润年增长率5年移动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4 税前工业利润率

税前利润率 = (总税收 + 总利润) / (流动资产总额 + 固定资产净值)。图中非国有企业指中国工业各正式部门中的企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然而工业利润率变动并不一定能代表经济整体的总利润率。实际在相关学术文献中，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自 21 世纪初以来利润率已呈下行趋势,且趋势在 2008 年后开始加速^①。立足于该情况,则须有相应解释来说明工业利润率与总利润率之间的分歧。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将总资本中越来越大的比重分配给相较于工业部门盈利能力低的其他部门,从而降低总利润率。这种猜想与当前中国经济盈利能力下降的三大解释之一相吻合,即租金侵蚀利润理论、工资侵蚀利润理论和资本-产出比率提升削弱盈利能力理论。这三种解释需要进一步仔细剖析,图 5 中的逻辑流程有利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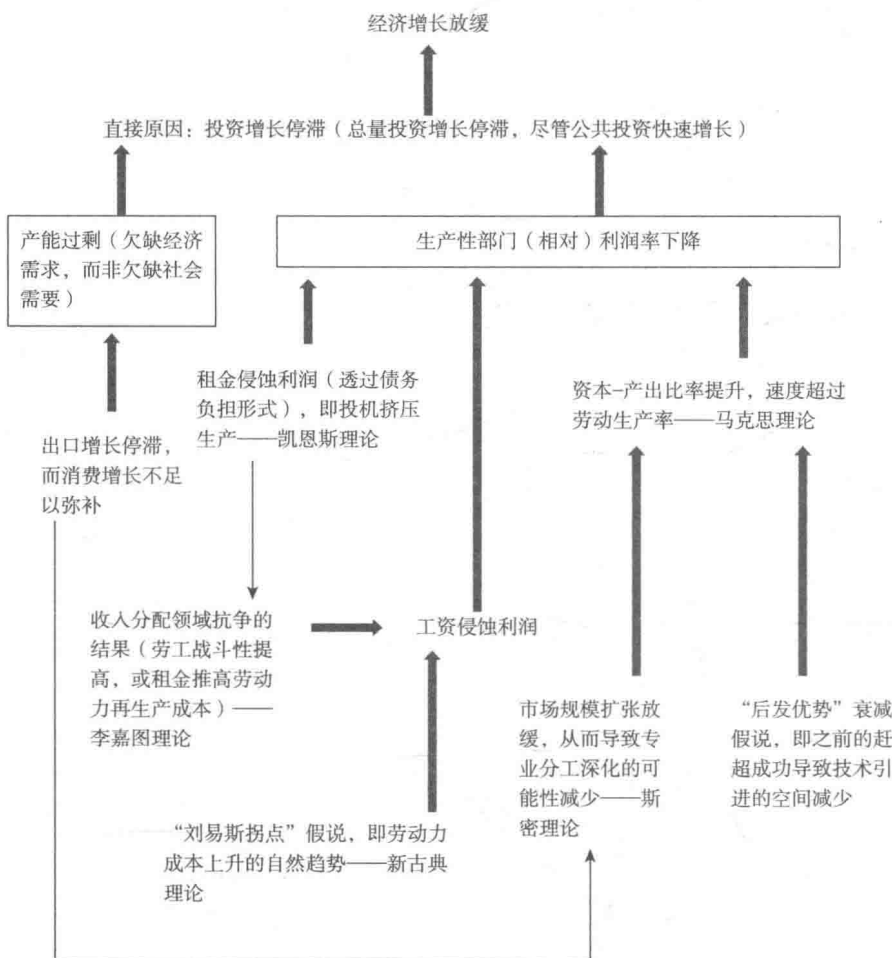


图 5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另一种解释

租金侵蚀利润指的是非生产性，甚至是反生产性的扩张活动。这类活动往往倾向于排挤生产活动。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该扩张通常产生于经济金融化，即金融自由化导致自由经济中的投机性金融资本占据整体优势。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化以大规模扩张之势促成房地产业与股票市场的繁荣景象和泡沫形成。这一过程涉及生产性企业参与投

^① 有关解释中国经济中利润率变动的学术研究及评价，详见 Gaulard (2013)、Li (2015)、Xie 和 Li (2016)。上述研究皆显示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

机活动、国际热钱流入和流出以及资本外逃现象。在此过程中,中国金融制度中抗御金融化的两道防线失效: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中的区隔崩溃,且跨境投机资本流动管制漏洞百出。归根结底,这其中存在强烈的政策导向原因。

工资侵蚀利润是现有新闻界、学术界以及相关文献范围的主流看法。其现实根据是显而易见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不再适用。因此,由下文可见,自21世纪以来,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人均产出的趋势,使得总产出中工资份额趋于上升。对此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是“刘易斯拐点”说,即中国过剩劳动力的耗尽必然使工资上升。其以著名的刘易斯模型为基础,主张经济发展过程是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型。其隐含前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铁律理论(即在纯粹市场环境中收入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其引申含义是工资提升不能超过铁律的容许限度,不能快于生产率提升,否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①。

二是“工资侵蚀利润”说,即劳动战斗性、维权意识的高涨使得收入分配向工资倾斜。基于新李嘉图经济学,收入分配取决于社会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质疑工资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与盈利,但新李嘉图经济学家却相信工资增长正是消费增长的基础,且有利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②。

三是“工资侵蚀利润只是错觉”说,即新常态下,工资虽有所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成本上涨更快,也就是说生活成本的上涨并没有反映在官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上。而实际生活成本的上涨实际是由城市房地产价格和租金驱动的,这其实是金融投机活动的结果。这便又回到了凯恩斯理论的“租金侵蚀利润”说。

资本-产出比率提升削弱盈利能力的理论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与此同时,也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不过,新古典主义的解释很简单:随着经济发展,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迟早会显现,而这兴许适用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例子。不过,更为系统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简单而言,这个趋势指的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往往是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c)与劳动力/可变资本(v)比率趋于上升,而因为在整个体系层面唯有劳动创造剩余价值(s),其结果就是利润率 $[r=s/(c+v)=(s/v)/(c/v+1)]$ 趋于下降。然而,在现实中,利润率下降有可能存在一系列“反趋势”,依靠提升剩余价值率 s/v 来抵消 c/v 比率上升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就当前中国的情况可以考察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增加劳动报酬,或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但这应该不符合当今中国新常态现实情况。如前所述,现实主导趋势是工资增长和工资份额提升,意味着抗拒剩余价值率的提升,反而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一致。

其次是需求增长停滞,也即市场规模扩张放缓,导致专业分工深化空间减少,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这种解释源自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而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外贸市场,正与当今中国对内需求不足、对外面临世界经济萧条的情况相一致。

^① Garnaut 等(2014)、Lu 和 Cai(2014)、Song 和 Zhang(2010)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因此,深化(市场导向型)改革对于避免中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言是必要的。

^② 有关解释中国经济中利润率变动的学术研究及评价,详见 Gaulard(2013)、Li(2015)、Xie 和 Li(2016)。上述研究皆显示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

最后是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就中国实际情况看,主要是所谓“后发优势”的衰减,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空间减少,碰到了技术封锁的“天花板”。这种局面,一方面固然是之前数十年成功赶超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又使当今中国必须面对如何依靠内部创新加速技术进步和调整结构体制条件的新难题。

总而言之,前文所述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复杂的。着眼于投资停滞,现存的系列论断都各自带有理论推导和现实依据。在不判断哪一论断离真相更近的情况下,下文将致力于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克服各种论调所主张的持续经济增长的重点障碍。

四、重塑经济转型模式

自 21 世纪开始到经济新常态最初几年,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结构性制度条件获得了卓越发展成果。其主要表现为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都呈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而这也为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包括提高就业、加大公共资助医疗保险体系覆盖率,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

表 1 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代表,显示出在改革时期各阶段中劳动力增长的变动。1978~2000 年,年均增长率是 7.66%。而在 2000~2012 年,速度加快,达到每年 9.67%的水平。这两个阶段的表现极为醒目。然而,随后几年,即 2012~2016 年,年均 6.84%的相对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也十分引人注目。

表 1 实际 GDP 和就业平均年增长率(单位:%)

年份	实际 GDP	就业	年均增长率
1978~2000	9.68	2.02	7.66
2000~2012	10.19	0.52	9.67
2012~2016	7.13	0.29	6.8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和《中国统计年鉴(2017)》

与此同时,工资率的变动同样值得注意。1990~2016 年人均实际 GDP 指数、城市劳工实际工资指数和农民工实际工资指数如图 6 所示。人均实际 GDP 指数增长与城市劳工实际工资指数增长趋势相近,而农民工实际工资指数增长情况则严重滞后,三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8.99%、9.45%和 7.10%。更进一步看,两种工资指数与人均实际 GDP 指数之间的比较也曾出现过逆转。1990~2000 年,上述三个指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27%、7.44%和 3.11%。随后,在 2000~2012 年,三个指标年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 9.57%、11.85%和 10.49%。这种实际工资指数相对占优势的情况通常存在于经济减速时期。在 2012~2016 年,三个指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57%、7.42%和 7.21%,且都呈现出大幅放缓的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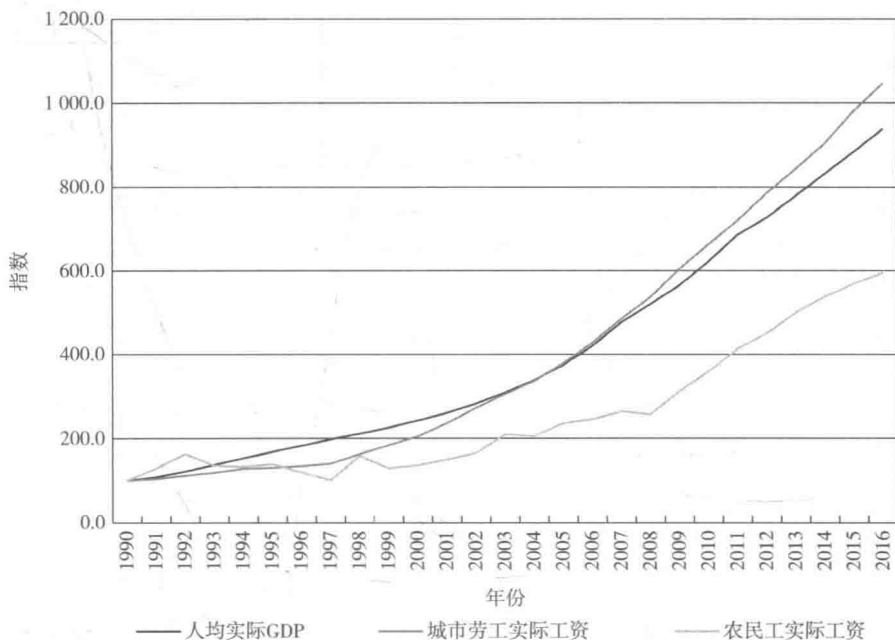


图6 1990~2016年人均实际GDP指数、城市劳工实际工资指数和农民工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和《中国统计年鉴（2017）》

上述经济和工资增长趋势亦构成投资增长的基础，还刺激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如表2所示，1978~2000年，年均实际消费增长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节）为8.92%，接近于投资增长率（由投资价格指数调节）的9.35%。2000~2012年，年均实际消费增长率上升到10.14%，投资增长率则高达15.01%。此后，2012~2016年，年均实际消费增长率回落至8.06%，而投资增长率骤然降至7.04%。

表2 消费和投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单位：%）

年份	消费	投资
1978~2000	8.92	9.35
2000~2012	10.14	15.01
2012~2016	8.06	7.04

注：数据按照支出法计算得出GDP中消费与投资构成（即总资本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和《中国统计年鉴（2017）》

而2000~2012年，生产率和工资率、消费和投资的同步增长，与其前后时期的表现大相径庭。如上文所述，这种同步性尤其与2012年前经济形势恶化的事态发展相对立。以工资增长为基础的快速消费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工资增长以可比的生产率增长为基础，因此并不会削弱投资上涨的势头。总体来看，这两对变量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平衡，从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产生良好结果。

支持这些关键变量同步增长的结构性制度条件，以及最终发展结果会是什么？为什么在新常态下，结构性制度条件会遭到破坏？在一些文献中，存在如此论调，即中国经济自

1950~1973 年便已凝聚起发达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发展模式。这种融合的路径及其所面临的中断,可能有助于解释从 2000 年早期到当今经济发展的曲折变化^①。

从理论上讲,“黄金时代”模型的特征以“大企业、大劳工、大政府”作为三大代表。“大企业”是指普遍以投资为主导的大规模企业,同时倚赖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基于动态收益递增产生的高速生产力增长是大企业存在的目的。“大劳工”则采取集体谈判的方式解决薪资问题,因此在收入分配决定中充当了资本的抵消力量。此外,它还有促进集体学习之特性,有利于生产力增长。“大政府”则是指福利国家,其有助于降低个体企业劳动成本,也有助于支持大规模生产动态收益所必需的大规模消费^②。

就中国国情而言,2000~2012 年,伴随着高速投资增长而产生的是被称为“国进民退”(国有资产进入,民营资本退出)的著名现象。体现出此类先进性的国有企业主要囊括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企业。它们即是中国“大企业”^③。同时,高速投资增长即生产力增长,促成了同样快速工资增长的物质条件,这使得“大劳工”雏形得以形成:不仅体现为工资增长本身,而且也在制度和政策行动上得到体现,如最低工资立法、劳动合同法、集体谈判和工会组织。“大政府”以国家的形式,致力于重建一个全面的福利制度。2003~2013 年,中国政府资助建立的医疗保健系统几乎面向所有国内人口。此外,为城市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来自东村地区的移民,提供可负担住宅,也已列入政府议程。影响更深远的是,旨在以劳工辅助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以“廉价劳工”换取经济增长的理念,也证实了如今全新的国家定向。

新常态下,回归“黄金时代模型”的路径反复中断也或许可归因于国家定向。明显地,2008 年后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投机活动挤占生产性投资,造成租金侵蚀利润。长期来看,金融化往往通过它对生产力增长的负面影响来限制工资增长(由此限制消费增长),且通常也一并恶化需求不足情况。

在中国,经济金融化最显著的表现是房地产行业和股市的投机泡沫。在这些行业中,繁荣和萧条景象蔚为壮观,吸引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尤其是 2015 年夏季股市崩盘和货币逐步贬值,都反映了投资活动中资本沉积、国际热钱出入以及资本外逃。

总而言之,金融化可通过观察“社会融资总量”(total social financing, TSF)实体经济的大规模股票扩张来衡量。这一指标包括银行贷款和由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的其他广泛融资方式。2003~2008 年,TSF 占 GDP 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随后,该比例从 2008 年底的 149% 猛增到 2016 年底的 208%。随着 TSF 在 GDP 中占比增高,银行贷款对 GDP 的比率从 2008 年的 93% (略低于 2002 年的 97%) 增加到 2016 年的 141%,

① 由 Piovani (2014)、Qi (2017) 的分析可论证中国劳工提取及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相应的, Hart-Landsberg 和 Burkett (2011), 以及 Panitch 和 Gindin (2012) 的研究重点则放在劳工提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广泛运用及影响上。

② 对 1950~1973 年先进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代模型”的内部动态和历史经验的详细阐述,可详见 Glyn 等 (1990) 的研究。Glyn (2006) 进一步比较了“黄金时代模型”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型”。此外, Lazonick (2009) 更通过其所谓“新经济商业模式”及“旧经济的商业模式”补充了一个更加互补、微观的阐述。

③ 2016 年,财富 500 强企业(按销售收入计)中,109 家中国(大陆)公司中的 80% 是国有企业。详见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7/07/21/030714725.shtml>。

同时，其他类型融资随之同比从 25% 增加到 68%^①。

在中国的银行中，规模最大的都是国有银行，且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和管控。然而，2008 年后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它们参与投机活动的自由。因此出现了关于多家国有银行进行不受监管的引资银行活动以求投机性收益的报道。相比之下，反而非银行融资活动受政府监管力度更大。事实上，这两种融资方式的迅速扩张，一方面只能导致投资活动资金的进一步沉积；另一方面，则会挤出生产性投资，最终在 2015 年陷入危机频发的窘境。

五、结 论

投资放缓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现实语境中显得相对复杂。而主流结构体制条件及内部分裂的国家定向最终催生出需求不足和盈利能力下降。因此，重塑中国经济转型模式是出于维持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转型主要面临两个相互对抗的发展方向：选择融入“黄金时代模型”，或选择倾向经济金融化。换句话说，上述对抗存在于巩固生产导向模式与转向投机导向模式之间。由此可见，以投机为导向的模式盛行造成了中国新常态实际中的许多经济问题。

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中国国家领导层在 2015 年股市崩盘和经济性能不断恶化后，其重新将自身定位转向强调遏制投资活动，同时促进生产性活动的方向的举措。这实际上也证实重新恢复或加快融入“黄金时代模型”在当下很有必要。然而，这种重新定位与取向能否实现中国未来中速或高速经济增长，仍有待观察。

参 考 文 献

- Akyüz Y. 2012. Financial Crisis and Global Imbalances: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Geneva: South Centre.
- Garnaut R, Song L, Cai F. 2014. Reform and China's long-term growth and development//Song L, Garnaut R, Cai F. Deepening Reform for China's Long-term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Gaulard M. 2013. Changes in the Chinese property market: an indicator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local authorities. China Perspectives, 2: 3-14.
- Glyn A. 2006. Capitalism Unleashed: Finance 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yn A, Hughes A, Lipietz A, et a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Marglin S A, Schor J B.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9-125.
- Hart-Landsberg M, Burkett P. 2011. The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Radical

①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银行 TSF 数据，<http://www.pbc.gov.cn/diaochaotongjisi/116219/index.html>。